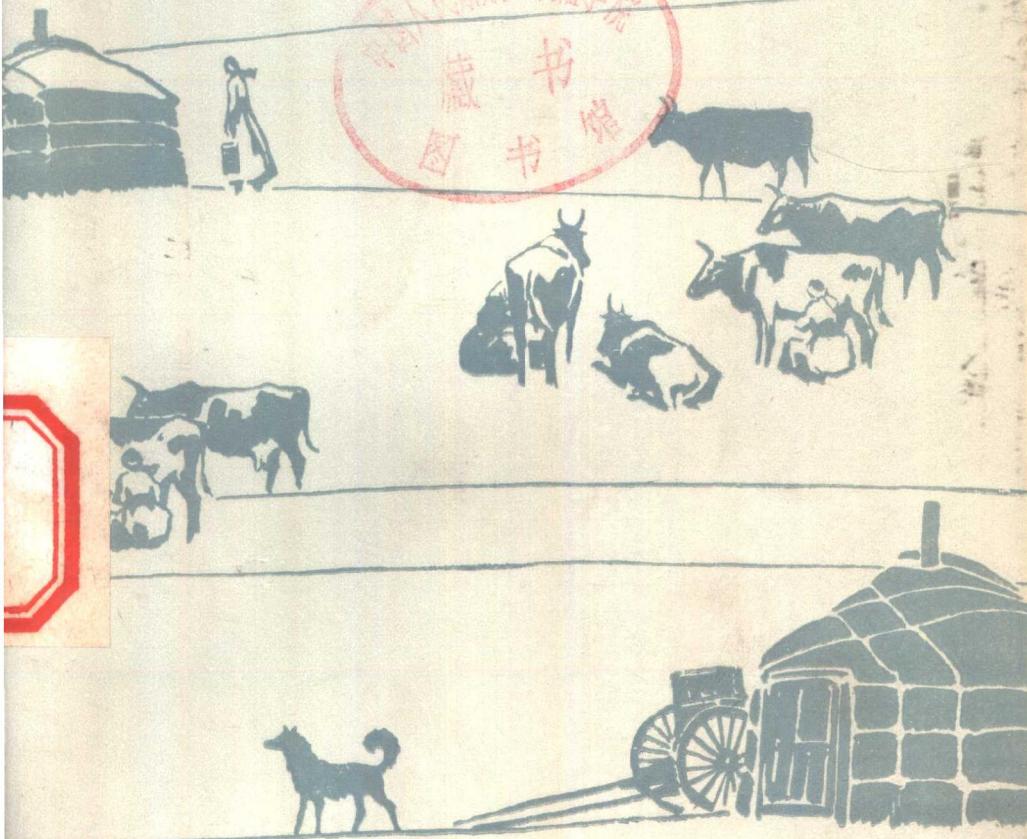


扎拉嘎胡中短篇小说选

ZHALAGAHU ZHONGDUANXIAOSHUXUAN



00311

扎拉嘎胡中短篇小说选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呼和浩特

扎拉嘎胡中短篇小说选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82 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1.375 字数:260千 插页:3
1982年3月第一版 1982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册
统一书号: 10089·224 每册: 1.05元

内 容 简 介

扎拉嘎胡是一位卓有成就的蒙古族作家。这部中、短篇小说选集，选编了作者从一九五一年至一九八一年发表过的二十二篇短篇小说和一部中篇小说。选集内容丰富多彩。作品或描写牧业社会主义改造，或歌颂社会主义历史时期草原上的新生活、新人物，或赞美蒙汉人民、干部之间的真挚友谊，真实地反映了内蒙古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前进步伐。有浓郁、朴质的草原气息和民族特色。作者以朴实无华的艺术笔触，塑造了众多性格鲜明、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深刻揭示了社会矛盾和人物的内心世界，形象地表现了党的政策的巨大威力，展示了草原人民光辉灿烂的前程。歌颂真、善、美，鞭笞假、恶、丑。感情真挚，文笔清新，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和草原生活气息。



作者近照

作 者 小 传

扎拉嘎胡，蒙古族，1930年生于内蒙古科右前旗斯力很村。幼年在家乡读小学，就爱好文学。解放后，先后在乌兰浩特师范学校和扎兰屯工业学院读书。1947年参加革命，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经常深入农村牧区开展工作，火热的斗争生活、层出不穷的新事新事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开始了业余文艺写作。1951年他在《内蒙古日报》上发表了第一篇小说《一朵红花》。接着，在各种刊物上连续发表小说、散文、游记。1956年新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短篇集《小白马的故事》，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中篇小说《春到草原》。1957年他的短篇小说《悬崖上的爱情》突然遭到批判，他因此受到各种处分，差点被推到“右派”的行列。尽管如此，他仍然没放下手中的笔，1959年作家出版社又出版了他的长篇小说《红路》。他的作品，有的被收到全国优秀作品集子里，或译成各种文字、介绍到国外读者中去。

1961年他入内蒙古大学文学研究班学习，结业后调内蒙古文联从事专业创作。他到包钢深入生活近一年，一边和工人一起挥舞钢钎，一边着手写作长篇小说《草原的早晨》，1965年完稿，原定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因文化大革命开始，被迫停止。作者接着也遭到了种种迫害。

“四人帮”粉碎后，他的《草原的早晨》经过修改1977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他焕发革命青春，继续勤奋创作，几年来又陆续发表了《嘎达梅林传奇》、《三十年的爱与恨》、《遥远的草原》、《滇南行》等十余篇（部）小说、散文。在创作上，他不知疲倦地向文学高峰攀登，是我国当代的一位优秀蒙古族作家。

目 录

亲爱的妈妈.....	(1)
山巅上的红松.....	(10)
苏古尔老头.....	(17)
护堤.....	(27)
雪拥青山.....	(32)
花酒瓶.....	(40)
草原在欢笑.....	(46)
钢铁骑手.....	(52)
友谊.....	(56)
“艾岩”.....	(63)
梅梅，我错了！.....	(68)
遥远的草原.....	(84)
悬崖上的爱情.....	(104)

草原上的新路.....	(126)
社员之间.....	(141)
扎玛丹.....	(154)
一朵红花.....	(161)
小白马的故事.....	(167)

献身.....	(181)
柳燕去过的地方.....	(188)
在起点上.....	(196)
三十年的爱与恨.....	(210)
春到草原.....	(254)

亲爱的妈妈

夜幕就象突然降落的一样，在不觉中四周漆黑了。

阴云依旧笼罩在高空，雨后的博古达山，横亘在夜色中。我焦急不安地“噢——唔——依——”的喊着，但听不到一点应声。迷失方向的我，大睁着失望的眼睛。

我一边走一边喊，最后声嘶力竭了，便无力地坐在一块水淋淋的山石上，懊恼着不幸的遭遇。

草原的天气，真是一日十变，早晨还那么晴朗，而中午下起雨来了。也算走运吧：碰上了一个避雨的山洞，躲过了一场大雨。可是谁又成想，这雨没完没了，一直下到黄昏。而我领着的这位女同志（刚由音乐学院毕业，初到草原来体验生活的），却发起高烧来了。惊慌中，我匆匆地走出山洞，由这山跑到那山，不仅没有看见一座蒙古包，到后来方向也辨别不清了。我又惶惑地急切地喊起来了。

正在这时，突然向我闪来一道亮光，我吃惊地险些从石头上跌下来！

“谁？”我失声地大喊。

“不要怕，我的孩子！”这突如其来的声音，象一股亲切的暖流，奔腾在我的周身。当我也打着手电筒，看清是一位年迈的老大娘时，我不安地喜出望外地喊道：

“啊！老妈妈！”

“孩子，害怕了吧？”老大娘喘着不匀的气，热情地安慰我，

“跟我走吧，在西边树上拴着两匹马。”

“老妈妈！我们一同出来两个人，那个是女……”

“她是你的什么人？”老大娘没有等我说完，把话抢过去问。

“我们都在呼和浩特工作。”

“在一个机关吗？”

“不，是两个机关。因为在旗里碰上了，就同道来这里。她是汉人，不懂蒙古话，我是给她当翻译的。”

“啊！好心的孩子，你会长命百岁的。”老大娘喜悦而爽朗地说。“她是个矮个子，戴眼镜的，对吗？”

我说：“对的。”老大娘看出我惊疑的样子，便向我说，她已经将我同道来的那位女同志抱回蒙古包了。我惊喜若狂，下意识地拽住老大娘的手说：

“好妈妈！”

我跟着老大娘走去。当我们跨上马背的时候，一阵冷风吹了过来，我和老大娘不约而同地在马屁股上抽了一鞭。

“老妈妈！您怎么知道我们迷失方向了呢？”

“咳！每逢刮风、下雨、下雪天，我就坐立不安呀！总想走出蒙古包，在山前山后转一转。有时候，领回好几个象你们这样迷路的孩子；有时候，也领回不懂一句蒙古话的南方姑娘。他们有的搞地质工作，有的搞铁路勘查，还有的搞气象工作，还有些盟、旗、苏木干部。我虽然年老了，但想做的事倒不少，可是我一无文化，二无本领，只好住在这山下，出门多备一匹马，为你们这些孩子做些工作，也算尽了我的一点心意！”

“老妈妈！您刚才说，每逢刮风、下雨、下雪天，就坐立不安，这是为了啥？”我没有听懂她的话，继续追问。

老大娘长出了一口气，没有说话。我以为触犯了她的戒律，也没敢再追问。我们又走了一阵，狗吠起来了。影影绰绰地望见了蒙古包。当我们来到蒙古包前，和老大娘把马拴在大轱辘车上。

后，便走进了蒙古包。

和我同道来的女同志安祥地睡在左边床上，身上盖着清洁的绿缎子被。看来她还没有退烧，老大娘摸了一下她的脑袋，转过脸悄声地向我说：

“比刚才好多了。”说着，她往炉子里添了几块干牛粪，然后洗了洗手，为我准备着饭。

“我给您添麻烦啦！”当大娘忙着切肉的时候，我满怀感激的心情说了这么一句。

她转过脸来望了望我，又从旁边的箱子里取出挂面说：“到我的蒙古包来，就是到了自己的家，我可不喜欢那种口口声声讲客气的孩子。”说话间，她把挂面煮好了。

这时，外面又下起雨来；老大娘披着雨衣出去了。我吃过饭，仔细打量了一番蒙古包的摆设，感到很多地方是特殊的：靠门放着一个三尺宽的红箱子，箱子里装满了挂面。这使我很失望，这么善良的老大娘，为啥做生意呢？门的对面横吊着一根长竿，挂着七八件干部服，每一件衣服兜里，都放着一般长的小木棍，只是数目不等。我又好奇地掀开衣服下面的漂白布时，嗬！原来是一架缝纫机。我这才明白，她的职业可能是裁缝兼做小生意？

过了好半天，老大娘请来了大夫。我将大娘和大夫的湿漉漉的衣服，挂在蒙古包的套那上。大夫给女同志看过病后，打了一针后，留了三包药，便走了。

老大娘和我安慰了一阵发烧的女同志，不一会儿，女同志又昏昏沉沉地睡过去了。老大娘用疲惫的眼睛望着我说：

“你怎么还不睡？睡吧！天不早了。”

“我不困。”

“走了一天，又迷了路，怎么不困呢？”

“那您为什么不睡呢？这一天你比我还累啊！”

“每逢下雨天，我是睡不着的！这时候，只有缝纫机的歌唱声来安慰我。”

“每逢下雨天……为什么呢？”我又莫名其妙地问。

老大娘的脸上立刻罩上了一层阴影。好半天也没有吱声，她从红箱子里拿出一张陈旧的照片来，递给我说：“每当下雨天，我就想起这些人。”

我一看，照片中间坐着一对中年男女，两旁是两个小孩。

“这是我在壮年时候照的。这是我的丈夫和我的两个孩子。”大娘的脸上浮起了无限追忆的神情，她含着泪水的眼睛望着蒙古包的哈那，不一会儿，泪水夺眶而出。“原先，我和我的丈夫是达尔罕王爷的世袭奴隶。日寇侵占了乌兰察布草原以后，达尔罕王爷投靠了日寇，当了蒙奸，日寇给了他一辆小汽车，他就让我的丈夫学开车。我的丈夫学了半年就学会了。那时候，为了维持生活，我离开了王爷府，搬到草原来住。我的丈夫时常开着汽车到家来看看孩子。

“那是一个狂风暴雨之夜，我的丈夫突然回来了。他拽开蒙古包的门时，两个孩子都被吓醒了，没等我开口，他打开手电筒，匆忙地喊着我的名字说：

“今天夜里我要护送一个真正有良心的蒙古人脱险。”他说着把手电照向旁边的人，那个人是个高个子，黑脸儿，一对大眼睛，一看就知道是个精明强干的人。而他的浑身湿漉漉的。我的丈夫接着说：“他叫布和。他专为咱这样的人干革命，说革命你可能不知道，就是让咱这样的人，生活得象个人，也就是推翻现在不公道的社会。因为这样，他才得罪了日本鬼子。日本鬼子到处抓他，所以我要把他护送到博古达山森林里，到那里就有了咱的人——共产党、八路军。”

“我和布和同志，在两年前就认识了，可一直没有和你讲，现在不能不给你讲了。我开的是达尔罕王爷的小汽车，他要发现我拉着布和同志逃跑了，一定要追问你的，所以让你事先有个准备。”

“我和布和同志早就商量好了。”我的丈夫猛地把自己的衣

衣服撕下来一大块，递给我说：‘这，你先拿上，等我们走后，你就拿着它投报王爷府去。如果在路上碰上日本鬼子或达尔罕王爷，那你就说，我的丈夫，开着王爷的小汽车，拉着一个可疑的人，不知奔向什么地方去了。他到家时，浑身都湿透了，可是也不烤一烤，在蒙古包里乱翻了一阵，我问他什么事，他也不说，只顾翻东西，我看他行动可疑就上前拦他。可他呢？凶恶地踢了我一脚，把我踢得仰面朝天，几乎断了气。就这样，我也没松开他的衣服，到最后撕下来这一大块衣襟。这时候，他和那黑汉子，不知说了些什么话。又向我踢了一脚，便急忙走出蒙古包，等我从后边追出来，小汽车已经不见影了。现在我是向你们报案来的，请你们无论如何把他们抓回来，咱是生来就是达尔罕王爷的奴隶，这种反叛，阿力亚保勒佛是不会饶恕的。’我的丈夫说：‘就这样做吧！只要做得不错，会保证你和孩子的安全。至于我，你就不用挂念，要活着，早晚会回来的。’说到这里，他又转过脸对两个孩子说：‘听妈妈的话，长的胖啊！’说完蹲下去，在孩子的脸上响响地亲吻了几下，就走出去了。

“我象有一根大骨头卡在喉咙里一样，浑身难受，不由地哭出声来；两个孩子也跟着哭起来了，好半天，我才哄好。当我送别他们的时候，在雨声中，布和同志向我说：

“‘请你放心，咱共产党、八路军很快就能给穷人争来天下。那时候，人人都一样，不愁吃，不愁穿啊！’

“蒙古包里，两个孩子喊着爸爸，而小汽车早已开走了。

“谁知道，我丈夫说的那些话，变成了遗嘱，那狂风暴雨的夜，变成了我永远怀念他的夜景了。”老大娘说道。

这时候，她似乎置身在狂风暴雨的夜里，被淋湿的周身，打着寒颤。然而，她却顽强地抗拒着。

“我记得很清楚，我丈夫走后的第四天，在半夜里，我正在翻来复去睡不着的时候，也没听到狗咬声，门突然开了，立刻有好几道手电光，把蒙古包照得通亮。我细细一看，达尔罕王爷和

四个日本鬼子，绑着我的丈夫进来了。我望着丈夫几乎要昏过去。两个孩子爬出皮毛筒，扑向他爸爸。日本鬼子一脚把两个孩子踢倒了。孩子哭了起来，我神志不清地抱住了两个孩子。

“‘你们不要牵连我的家人，有天大的事儿都由我来担当，与家里一点关系也没有。’我的丈夫大声地喊，那声音在我听来，好象离得很远很远……”

“达尔罕王爷和一个鬼子耳语了一阵，一个卑躬屈膝的蒙奸翻译着：‘老母狗！让你那两个崽子站起来。’

“我一听这恶狠狠的声音，立刻把两个孩子抱得更紧了。可怜的孩子，瞪着大眼睛望着我，紧紧地抓住我的手。这时候，鬼子一个箭步蹿到我跟前，把大孩子猛力夺过去，用不熟练的蒙古话叫着我丈夫的名字说：

“‘你要是说出来布和的去处，那就没有你的事，你要不说，就把你这小孩的脑袋打碎，明白吗？’说着把马刀抽了出来。

“‘达尔罕王爷！这可不能啊，他是不懂事的小孩子。我抱住达尔罕王爷的腿说。

“‘达尔罕王爷和鬼子把我用力地踢了一脚。

“‘你要孩子的话，那你就快些劝你丈夫，让他把皇军提的事通通讲出来，不然……’

“我的丈夫藏住说：‘放走布和，是我一个人干的，这与我的孩子毫无相干。你们这些畜生，不要残害这些无辜的孩子。’

“‘你要为你的孩子着想，那就要放聪明些。’达尔罕王爷狂喊着。

“这时候，站在我旁边的那个鬼子的洋刀一闪，我的孩子倒在地上了。我猛的扑上去，昏倒在地上。当时，只听到我丈夫大声喊着：

“‘你们这些畜生！早晚有人要和你们算这一笔账的。’

“当我醒来的时候，我才发觉我躺在血泊中。我用尽全身力量，抬起头，向两边一看，我的丈夫和两个孩子早已血肉模糊

了。我用左手拽了一下我丈夫的手，他用低沉的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布和同志还活着，他们是抓不着他的，他会找你来的；你要保护他，听他的话。只有他那样人，才是我们的救星，靠山，为他们这样人死了，也值得。’他说到这里，往下就不说了。我又使出全身力量，拽他一把时，他不动了。我又第二次昏过去了。

“再次醒过来的时候，我躺在一个干燥的石洞里，向周围一看，全是陌生的人，我跳起来喊我的丈夫，孩子，而这些陌生的人同情地掉下了眼泪，一个高个子向我说：

“‘我们把你的丈夫和孩子，全埋在这山下了。等我们胜利后要为你的丈夫立碑。将来我们每一个蒙古人，都不能忘记你们一家人。走！我领你到墓前去看看。’当我走到墓前时，我才认出这位高个子就是布和。原来，是他领着一伙英勇善战的人，把我们抬到博古达山来的。

“布和同志告诉我，他们跑出来后，第二天早晨，日本鬼子的汽车已经追上了，我丈夫让布和同志下了小汽车，躲在茂密的草丛中，他自己开着汽车跑起来，跑到一个山下时，汽车坏了，人也被捕了；而布和同志逃出来了。

“从那以后，我遵照丈夫的话，完全听从布和同志的指挥去生活。为了便于布和等同志的活动，我就住在博古达山边。这博古达山的名字，是解放以后改的，是为了纪念我丈夫，用我丈夫的名字命名的，原来的山叫哈丹巴特尔山。”

“我住在山下，那时候，为了了解敌情，在一昼夜中，曾爬山过水，跑过三百多里路，为传递一封信，野宿在遮天盖地的森林里，听过狼嗥虎叫。为给山里游击队送吃的，背着煮熟的羊肉，曾在深山里迷过路。

“后来，为了更有力地打击敌人，布和同志让我离开博古达山，去给牧主放羊。那时，在这一带，鬼子设了很多的国境警察。要想通过敌伪的封锁，必须想些使敌人出其不意的办法。有

时候，我赶着羊群，同志们跟着我走。每当碰见那些狗腿子警察，他们就披上我特制的羊皮，混在羊群里。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地通过了封锁线，保证了他们的安全。

“快要解放那一、二年，活动的人更多了，活动的方法也愈来愈妙。这时候，我只是给他们上山放哨，有动静就报告给他们……”

“直到解放后，他们这些人都到城里去了。布和同志来了一趟。那时候，他在呼和浩特哪一厅当厅长。他带来了政府给我的慰问品。同时他又亲自给我的丈夫修了一座纪念碑，这碑在西边，你明天去看看吧。”

老大娘说到这里，露出了喜悦的笑容。喝了一口奶茶，继续向我说：

“解放后，我真的返老还童了。生活不感到孤单，到处都是亲人。特别是看到你们这些孩子，就象看到了我亲生的孩子一样高兴，不是吗？”老大娘说着站起来，掀开床头的红箱子，拿出一个方方的纸盒递给我说：“这些照片中有上海、北京的姑娘，也有内蒙古东部农村长大的孩子。这些孩子，有的搞地质工作，有的搞盟、旗、苏木的工作，他们路过这里时，都在我的包里住、吃、睡，我不管他们是蒙古人还是汉人，都一样看待。我知道他们都是为革命工作，凡是为革命的，我都看作是我亲爱的孩子。”

我一面听着老妈妈的话，一面接过照片看着，当把照片还给老大娘时，我又望了一下宽大的挂面箱，于是不由自主地问道：

“老妈妈，您这些挂面和挂着的衣服，是……”

“孩子，这是我几年来积累起来的。我每次到供销社，只要身上有钱，都要买回来一些挂面。你知道，这一带象你这样的孩子，来来往往地愈来愈多了，有些人吃不惯羊肉，我就给他们煮挂面。”老大娘又往炉里添了几块牛粪，继续向我说：“那些衣服，都是在这一带搞地质勘测、气象调查，还有盟、旗、苏木干部的衣服。我也不能干其它活，只能给他们缝缝补补，洗洗涮

潮，好让他们安心工作。我这台缝纫机，是用去年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慰问团，慰问山区革命根据地的人们时，送给我的钱买来的。”

我这才恍然大悟，对老大娘更加敬佩了。

“我一说起话，就不顾对方的疲劳了。孩子，你睡吧！”

“老妈妈，衣服里的那些木棍是做什么用的呀？”我问。

“啊！那是算明日期的。我老了，记性差，就想出这么一个办法，需要几天做出来的，就放进几个木棍。有些孩子，工作挺忙，到我这里取衣服，都是有时间的，所以我就准时给他们缝补好，来了就能带走。”

“老妈妈，您也睡吧！”我往炉子里添着牛粪，尊敬地说，“已经很晚了，明天您老人家还有事。”

第二天早晨，和我同道来的女同志终于痊愈了，她激情满怀地说，她想谱写一曲歌颂革命老妈妈的交响乐。为我们、为集体忙了一夜的老大娘，眼睛深陷下去了，然而却幸福安详地闪着光辉。受老大娘亲切地款待之后，我们又向草原的中心出发了。她淳淳的嘱咐我们：返回时一定来看她，并详细地给我指点了路子。我们望着她的脸，她脸上的皱纹已不为昨夜那悲壮的故事锁着，而是舒展开了，宽阔的额角上，呈现出令人敬慕的光芒。

“亲爱的妈妈！……”我们谈着英雄妈妈的事迹，心情久久地不能平静。

1958年4月于呼和浩特